

发动武装起义 组织兵变创建红军

■本报记者 陈会义 顾问 刘志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

由于当时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党的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事关中国革命存亡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各地党组织所做的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建立红军，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十万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颍贺坡兵变建立红十五军，舞阳下澧河店兵变建立红九军。”9月14日，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伟告诉记者。



为纪念红九军，舞阳县孟寨镇澧河村修建了红色广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杨旭 摄



红九军在这棵400多年的古槐树下动员后整装出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杨旭 摄

临颍贺坡兵变筹建红十五军

1930年初，中原大战爆发，一时中原大地军阀混战，互相倾轧，人民苦不堪言，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为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中共河南省委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在驻扎临颍的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师中举行兵变，建立红十五军。以中共豫中特委书记杨健民，七十五师参谋长郑宝钟，临颍县委书记老王，工人老李、方根（符元亮）五人组成省委，杨健民为省军委书记和十五军政委，郑宝钟为军长，老李和方根负责政治部工作。郑宝钟，河南孟津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任宋天才七十五师上校参谋长。该师系北方杂牌军，官兵多为重义气的绿林好汉，易于接受党的宣传。郑宝钟利用其参谋长的合法身份，暗中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搞军运策反，鼓动大家走革命道路。

1930年春，中共豫中特委书记杨健民带领老李和方根深入驻扎在临颍东南部贺坡村的七十五师士兵中开展革命活动，准备发动军事

暴动，举行武装起义。郑宝钟接到这一指示后，积极联系共产党员连长、排长，并和其他连长、排长结拜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连发动，又秘密发展了一批军官加入共产党，为兵变奠定了良好基础。

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杨健民、郑宝钟在贺坡村贺应离家召开了二十余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兵变计划。当时七十五师共有三个团，有两个团驻扎贺坡村，另一个团驻扎在3里以外。驻扎贺坡村的两个团共有18个连，其中有6个整连和3个半连的兵力已被党组织掌握。郑宝钟主张把已被掌握的力量发动起来，向没被掌握的连发动袭击，号召其缴械，然后开展游击活动，初步完成建立红军的第一阶段工作。郑宝钟坚定地说：“这次暴动定能成功。”对这一部署，大部分到会者表示赞成。杨健民却提出异议，他主张暴动后第一步按照郑宝钟的意见行事；第二步将驻扎在3里外的另一个团包围，消灭敌人后再打游击。郑宝钟认为这不切合实际，因贺坡村距火车站

下澧河店兵变建立红九军

1929年夏，杨虎城部由胶东开赴南阳，总部驻扎南阳城内，各旅分驻附近各县，其中冯钦哉旅驻防舞阳县下澧河店。该部中共地下党员姚洗心迅速与南阳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使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有了密切联系。地方党组织及时向部队输送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同时部队党组织也积极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使地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中原大战爆发后，为把军阀战争转变为革命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长江局军委和河南省委着手在杨虎城部组织兵变，并组建了杨部地下军委。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局办事处派白玉文作为特派员到南阳领导兵变。白玉文到南阳后，在杨虎城部教导队一地下室主持召开杨部地下军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委负责人孙永康、张焕民、刘煊，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书记郝久亭，《宛南日报》负责人石仲伟、冯异僧。会上，白玉文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局办事处关于进行兵变的指示，并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中央决定利用蒋、冯、阎各军阀间的战争暂时减弱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这一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力争把军阀之间的相互战争转为革命战争。与会同志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杨虎城部中早有党的活动，尤其在第一旅冯钦哉部，中共的组织基础更为雄厚；南阳城内的四个教导大队中有三个已被掌握，随时可以响应党的号召。据此，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首先，重视组织基础较好的冯钦哉旅的兵运工作，先在那里发动兵变，然后由南阳城内的教导队作出响应，占领南阳。同时，地方党组织发动各界群众，予以配合。这一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就可以割据豫鄂边区。

会后，白玉文在孙永康的陪同下，到杨虎城部第一旅驻地舞阳下澧河店一带进行实地观察和具体部署。当时，该旅有党员100余人，能直接控制的有旅部手枪连、密查队和卫队营，各团由共产党员掌握并受其影响的约有17个连2000多人。白玉文、孙永康和手枪连连长张焕民（杨部军委成员）分析情况后，认为所制订的兵变计划是可行的。于是，密查队以打麻将为名召开秘密会议，组建了指挥兵变的前敌委员会，由孙永康任书记，张焕民任组织委员，旅部书记官王某任宣传委员，卫队营营副刘煊任军事委员，密查队长姚洗心任交通员，白玉文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加入前敌委员会工作。前敌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派党员深入士兵中去，以反对军阀混战、索要数月的粮饷为号召，发动和组织兵变力量；另一方面派出人员侦察周围敌人的兵力情况，决定兵变后部队的行军路线。

7月，由于杨虎城部第一旅开展工作过急，泄露风声，师部密查处处长刘依中到第一旅了解部队动向，被姚洗心应付过去。据此，前敌委员会决定趁旅长冯钦哉因事去南阳之机，提前发动兵变。

7月29日晚，在前敌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张焕民、姚洗心首先把手枪连、密查队拉出，协助刘煊击毙了正在熟睡的卫队营营长，控制了卫队营。随即对旅部进行袭击，击伤一名副旅长，打死参谋和军需处长等十余人。兵变开始后，其他连队一些受共产党领导的士兵自动前来参加，共拉出700余人枪，战马80余匹，缴获银圆数千元。前敌委员会当即把缴获的银圆分发给兵变战士，并拿出一部分接

仅二十多里，那里有国民党军驻防，并利于国民党从许昌、漯河调兵支援；兵变部队兵力不足，又未经过考验，如果刚暴动起来就打硬仗易遭损失。双方争论不下，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杨健民以命令口气宣布会议结束，要求大家等候指示再行动。

由于这次会议到会人数多，会议时间长，不慎泄露了秘密。次日夜，敌人以开会为名，诱捕了郑宝钟和一位连长。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高敬轩受牵连被捕，后经营救出狱。

杨健民、老李和方根及时逃出许昌。兵变未能起事即遭镇压。敌人多次审讯郑宝钟，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谈笑自若：“为党死光荣，为民生死情愿，死我一个没关系，坚信革命定成功。”

1930年农历七月初二，敌人将郑宝钟秘密杀害于夏城村西北。群众冒雨将烈士遗体收殓，用农车运至车站。七十五师部分官兵为纪念暴动牺牲的烈士，购买了成捆纸张焚烧祭灵，附近群众闻讯也含泪哀悼。

济贫苦群众。

随后，前敌委员会将部队重新整顿，按照预定路线南行，天亮时到达叶县望夫石山南。在那里召开的誓师大会上，孙永康和白玉文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和这次暴动的意义，让每个指战员明白自己加入了工农红军、走上了工农革命的道路。

大会最后通过选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的领导机构，张焕民为第九军司令员，孙永康为政治委员，姚洗心和刘煊为副司令员，王老汉为政治部主任。为了不打乱建制，以手枪队原有人员约200人为第一支队，仍以张焕民兼任支队长；以原卫队营约400人为第二支队，仍由刘煊兼任支队长；以原侦察队的数十人和旅部直属部队人员约200人为第三支队，由姚洗心兼任支队长。

会后，部队按照新建制，排好队形，唱着军歌，继续向南阳方向前进。

一天后，当部队到达社旗镇时，遭到敌军的包围。突围出来的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临时改变计划转向鄂豫皖边区，想与徐向前部会师，但走到泌阳时，遭民团王友梅部截击后被打散。白玉文、张焕民、刘煊被捕，被敌人杀害于泌阳。

“这两次兵变由于冒险行动，敌我力量悬殊，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缺乏游击战的经验，从而导致了失败。但革命前辈这种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为革命忘我牺牲的精神，将会激励后人奋勇前进。”刘志伟说。



中共特别党员胡愈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张登文

在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开展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特别党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着新闻出版界“全才”美誉的胡愈之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代表。

1933年9月，胡愈之经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张庆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领导的、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主要任务是为党搜集情报。当时，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央特科驻沪成员仅有十余人，且分散活动。入党后，胡愈之积极寻找契机，利用一系列略带戏剧性的事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4年初，鉴于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仍然是爱国群众的迫切需要，胡愈之邀请东北著名实业家杜重远出面创办《新生周刊》。杜重远是东北实业家，创办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陶厂，曾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兼任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公署秘书，倡导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遭日本关东军通缉到关内，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骨干。杜重远在政商两界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故由他出面注册《新生周刊》并任主编兼总发行人，编辑工作仍由胡愈之等人负责。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登载该刊编辑艾寒松以笔名“易水”写的短文《闲话皇帝》，事先按规定送交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并通过。刊物发行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称它“侮辱天皇，妨碍邦交”，鼓动日本浪人上街游行和打砸。同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谢罪、派亲日作家审查书刊、严惩此文作者和编者。国民政府一方面摄于“友邦惊诧”，命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道歉、撤换公安局长、逮捕文章作者（艾寒松先是躲藏起来，后出国），随后发布《申做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并设妨害邦交罪，以惩处反日宣传者；另一方面又想息事宁人，从南京派委员会同杜月笙等人与杜重远谈判，恳求他自认《闲话皇帝》一文没有送审，代政府承担责任，政府搞一次假审判并罚款了事，钱由国民党出。杜重远不想为难国民政府，与胡愈之、艾寒松商议后，同意开庭时如约违心承认没送审。不料，日本领事馆竟派员擅入法庭内室“监督”法官合

议，进一步施压。结果，国民政府食言，判处杜重远14个月监禁，并查禁《新生周刊》，原定的假审判变成真冤案。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

当时，此类文化“围剿”案件确实很多，大多不公开报道，社会影响有限。“新生事件”涉外，驻沪日本报纸带头公开鼓噪，国内报刊也趁机跟进报道，在全国以及国民党内引起巨大反响，成为随后发生的全国范围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导火索。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和东北军官兵对国民党拿东北人讨好日本政府的行为愤慨不已，杜重远成了他们心中的抗日英雄。杜重远又与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有旧，狱中待遇格外优厚。他住着监狱空地上特建的三间房子，自带厨师，有家人照顾，可随意接待访客，还有电话与外界联系，反而能避开特务监视、各界人士尤其是大批前来探望和慰问的东北军上层人士。

其间，胡愈之每个周末都去看望和陪伴杜重远，协助他做东北军将士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说服，他们争取到不少东北军重要人物。杜重远特意把张学良公署的另一位原兼职秘书高崇民介绍给胡愈之。经过数次深谈后，高崇民最终被胡愈之说服，同意策动东北军联共反蒋抗日，遂回西安劝说张学良。不久，张学良秘密探望杜重远。杜重远劝他联共。张学良欣然同意，回西安后让高崇民去劝说杨虎城，促成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杨虎城随后也探望杜重远，商讨联共事

宜。在胡愈之、杜重远等人努力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转向联共抗日，发生西安事变的条件已经具备。

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已有成效是极其重要的情报，需要尽快报告中共中央。但胡愈之的联系人严希纯恰巧被捕，胡愈之与组织失去联系。他立刻赶赴香港，找到已担任华南工委书记的原联系人宣侠父。后者与中共中央也无联系，遂让胡愈之去巴黎找《救国时报》的主编吴玉章，再去苏联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汇报。胡愈之在港期间，中共代表团回电同意他去汇报，并称苏联作家高尔基邀请鲁迅去苏联疗养，要他陪同鲁迅前往。胡愈之马上返回上海面见鲁迅。但是，鲁迅坚持留在上海开展斗争。告别鲁迅后，胡愈之再次南下香港并乘船到法国，1936年2月抵达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潘汉年汇报东北军情况。路途两万公里，耗时三个多月，待他汇报时，中共中央刚好通过其他途径与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同蒋介石方面取得联系。他的工作似乎没有发挥直接作用。胡愈之返回上海后，杜重远也告诉他东北军的问题（联共反蒋抗日）已经解决了。为做到绝对保密，他们不再对任何人谈及东北军之事。

正确看待胡愈之对东北军的工作，必须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在共产党方面，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8月1日，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1日，中共在巴黎主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报》公布《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在国民党方面，《八一宣言》公布后，蒋介石从1935年底起多方试图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尝试开启国共谈判。而胡愈之是到莫斯科后才得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他对东北军的工作，在党的新方针和政策形成前就已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他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先行者之一，是在没有中共中央精神和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独自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果断冷静开展工作的，展现了其远见卓识，可谓是大智大勇。他的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开启中共中央与张、杨两位将军的谈判，但是对他们立场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

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中共特别党员，从光复入党的那天起，不管环境如何险恶、任务如何艰巨，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孜孜以求、矢志不渝。他们的优秀品质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勇毅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